

“生态帝国主义批判”的马克思主义生态学探赜

赵 方, 郝庆治

摘 要:“生态帝国主义批判”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界意指一种源自经典马克思主义批判概念与方法, 并经由以生态马克思主义为代表的批判理论及其思潮的自觉构建, 而逐渐形成的对全球性资本主义社会生态问题的系统性批判分析。与早期主要由环境史学界主导的研究范式不同, 国外生态马克思主义相继涌现出空间政治经济学批判、世界体系政治生态学批判、新陈代谢断裂批判以及社会生态转型批判这四重极具代表性的研究进路。其批判聚焦点及分歧主要集中在“什么是生态帝国主义”和“怎样研究并应对生态帝国主义”这两个核心问题上。展望未来, 亟须在三个方面深化研究: 其一, 充分把握国外生态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帝国主义批判”限度; 其二, 自觉强化经典帝国主义与“生态帝国主义批判”的有机关联; 其三, 加快推进“生态帝国主义批判”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构。这对于突破西方话语垄断, 回应全球南方的正义诉求, 以及迈向全球社会生态正义新未来具有关键意义。

关键词: 生态帝国主义; 马克思主义生态学; 生态马克思主义; 中国自主知识体系; 全球治理

中图分类号: B82-05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0169(2026)02-0010-13

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与生态危机深度交织的当代世界, “生态帝国主义”(Ecological Imperialism) 作为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必然产物, 正深刻塑造着以社会生态非正义为核心特质的全球格局。确切来讲, 全球北方凭借其在资本、制度、技术及话语权等方面的霸权地位, 持续将本土环境成本与生态压力系统性地外溢至全球南方, 并借助贸易壁垒、气候谈判、能源争端等多重机制, 不断巩固其在全球体系中的资源攫取能力与生态支配地位。这一过程不仅导致全球生态系统的急剧退化与自然资源的过度消耗, 也进一步诱发了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增长乏力、发展鸿沟扩大、社会结构撕裂、地缘冲突加剧以及全球治理体系失灵等一系列连锁反应。在此意义上, “生态帝国主义”已然成为理解当代资本主义世界秩序演变及其内在危机的关键切入点。相应地, 立足于环境史学与文学等广义左翼批判传统, 近年来以马克思主义生态学为核心的前沿学术阵地日益关注到“生态帝国主义批判”研究深拓的紧迫性。相关探讨不仅有力推动了作为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前沿思潮的生态马克思主义与更宏观意义上的绿色左翼政治理论的蓬勃发展, 更为探索全球生态正义、社会正义乃至人类文明永续发展的现实政治路向提供了重要启益。

基金项目: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专项项目“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国际传播媒介、路径、机制及其经验研究”(2022JZDZ011); 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重大攻关专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话语理论体系及其原创性贡献研究”(25LLMLA012)

作者简介: 赵方, 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zhaofang@stu.pku.edu.cn (北京 100871); 郝庆治, 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一、“生态帝国主义批判”的议题源起

“生态帝国主义批判”作为横跨多学科的重要议题,其研究最早可追溯至阿尔弗雷德·克罗斯比(Alfred W. Crosby)所奠定的“新环境史”——全球环境史领域。在全球环境史的原初研究语境下,“生态帝国主义批判”将生物交换置于分析核心,着重探查殖民扩张时期欧洲殖民者通过系统性引入动植物物种、病原体及生态系统改造技术,在殖民地构建符合欧洲人生存需求的“新欧洲”,进而实现生态替代与社会重组的历史进程。该研究范式在本质上将生态帝国主义界定为一种以生物性力量为根本动力的非对称生态扩张机制,因而在学界通常被视作或界定为“生态扩张批判”研究路径,并成为克罗斯比治史的独特“脚本”^[1]。

具体来讲,“生态帝国主义”这一术语,最早由克罗斯比在《生态帝国主义:欧洲的生物扩张,900—1900》一书中提出,其概念意指欧洲殖民扩张中有意或无意携带的外来种植物与细菌,导致被殖民地区出现了不可逆转的强烈生态环境变化和生物种群崩溃现象。克罗斯比认为,欧洲的全球扩张不仅仅是文化、政治或军事的征服,更是“生态的征服”,即外来物种的引入、生态系统的改造与全球生物地理格局的重塑^[2](P294—308)。对此,他指出欧洲帝国主义之所以成功,关键原因不在于坚船利炮的技术和生产工具优势,而在于能够摧毁原住生态系统的生态优势。在另一部著述《哥伦布大交换:1492年以后的生物影响和文化冲击》中,克罗斯比着重探讨了自西方地理大发现时代以来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物种的大交换”。在他的分析思路里,这种大交换本质上正是生态帝国主义的实践体现,欧洲通过殖民扩张实现了对美洲的资源掠夺与生态控制,其后果不仅包括物种入侵引发的生态失衡,更标志着全球化进程中人类活动对自然系统的主导性干预。正如历史所证实的那样,“人类与他带来的动植物,在过去400年内消灭的生命种类,可能比100万年进化灭绝的物种都多……为了眼前方便,我们劫掠了未来”^[3](P131)。

循着克罗斯比开创的“生态扩张批判”路径,在20世纪末,以迈克·戴维斯(Mike Davis)、贾雷德·戴蒙德(Jared M. Diamond)为代表的一批学者,通过将气候、生态危机与殖民主义、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讨论相结合,在全球环境史学界为“生态帝国主义批判”拓展了新的研究疆界。其中,作为左翼环境史学的标志性人物,迈克·戴维斯在《维多利亚晚期的浩劫:厄尔尼诺饥荒与第三世界的形成》一书中聚焦于19世纪末全球性厄尔尼诺气候事件引发的饥荒,力图揭示这些表面上的自然灾害实质上与殖民主义及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之间存在本质关联。他的核心判断是,全球性生态灾难并非纯然的“天灾”,而是帝国暴力、殖民剥削以及环境失控共同作用所导致的系统性浩劫,并直接促成现代“第三世界”依附性地位的形成^[4](P293—414)。在戴维斯的论述中,克罗斯比提出的“生态帝国主义”被进一步深化为一种通过环境改造、资源掠夺与气候治理等方式而维系的全球权力网络。与此同一时期,贾雷德·戴蒙德则以浓厚的生物地理学视角来审视“生态帝国主义”现象。在其著述《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中,他着重强调生态与地理因素在历史进程中的决定性作用,指出正是大陆轴线走向、驯化物种库差异和病原微生物演化共同构成了欧洲殖民的技术与生态优势,从而将殖民统治着重解读为环境禀赋所导致的必然结果^[5](P195—294)。总体来看,以上学者探索性地将全球权力关系、世界体系架构等要素纳入全球环境史的研究视域,考察了帝国主义对世界历史进程中落后国家和地区生态资源的深度掠夺,从而为广义上的生态史批判路径拓展了理论纵深。但需要指出的是,戴蒙德的研究大多停留在生态-地理决定论的层面,缺乏对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深入揭示;而戴维斯虽然已在灾害史的脉络中凸显出资本主义全球扩张与生态危机之间的内在关联,但其分析仍主要建立在灾难与殖民历史的现象学与经验叙事之上,尚未完全展开系统的理论化建构工作。与克罗斯比一样,他们更深层且本质的共性问题在于,均未能揭示

出资本逻辑与生态帝国主义之间的实质关联，以及资本主义制度的反生态本性。

事实上，在环境史学界率先提出“生态帝国主义”概念并开展相关研究之后，文学与文化研究领域较早地在后殖民理论框架下接续并拓展了这一议题，逐步形成了一种独具特色的“后殖民生态批评”（Postcolonial Ecocriticism）研究路径。其中，比尔·阿什克罗夫特（Bill Ashcroft）等学者在《后殖民研究：关键概念》中着重剖析了后殖民主义与环境、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指出殖民叙事借助“热带伊甸园”等自然意象建构权力话语，运用文化想象掩饰殖民暴力，该研究为理解生态帝国主义的社会文化影响提供了关键理论视角^[6]（P54-58）。在《慢性暴力与穷人的环保主义》中，罗伯·尼克森（Rob Nixon）通过文学文本和环境叙事分析，揭示了殖民话语及其在当代全球化中的延续如何遮蔽生态剥削。他提出“慢性暴力”（Slow Violence）这一概念，用以描述生态帝国主义对全球南方地区在环境、文化与制度层面的持续作用机制^[7]（P128-149）。此外，格雷厄姆·哈根（Graham Huggan）与海伦·蒂芬（Helen Tiffin）同样强调，殖民主义借助“荒野”“伊甸园”等文学意象合法化对土地与资源的侵占，这一过程深刻反映出殖民行为及其话语背后的人类中心主义意识形态^[8]（P27-145）。总的来看，“后殖民生态批评”路径聚焦于文学中的物质世界和社会关系，致力于将后殖民批评的“生态转向”与生态批评的“后殖民转向”相结合，深刻揭示出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全球扩张进程中的社会文化影响^[9]。然而需要指出的是，该路径在一定程度上局限于话语、文化和伦理等维度的批判，对生态帝国主义背后的全球资本主义体系、资本积累模式等实质内容分析尚不充分。

综上所述，环境史研究中的“生态扩张批判”与文学研究中的“后殖民生态批评”，虽在揭示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与生态变迁之间的内在关联方面贡献了重要洞见，但仍未能充分挖掘出全球生态危机背后深层的资本逻辑、权力关系与制度性根源。尤为关键的是，“生态帝国主义批判”的核心关切，在于帝国主义所蕴含的生态面向与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趋势，这就要求“必须将马克思主义对帝国主义发展的传统批判与生态批判结合起来”^[10]。在此背景下，系统引入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的相关资源——尤其是生态马克思主义思潮及其理论成果，不仅是深化“生态帝国主义批判”研究的必然要求，更是推动该批判向纵深发展进而指引现实社会生态变革的关键所在。

二、“生态帝国主义批判”的马克思主义生态学进路

作为极具批判性的研究视角，马克思主义生态学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与方法，对当今世界所面临的社会生态环境问题作出了独具特色的系统性政治哲学阐释，在剖析生态帝国主义方面展现出关键优势^[11]。它着眼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运行机制及其反生态本性，犀利批判其对自然的剥夺与改造行径，清晰揭示出在帝国主义扩张进程中生态环境危机产生的内在逻辑链条，提出了超越生态帝国主义、实现全球社会生态正义的未来方向与实践理路，呈现出鲜明的“红”（社会革命）“绿”（生态运动与革命）相结合的核心理论旨趣。这种“红绿”分析不仅触及生态危机的表象问题群，更深入资本主义制度的核心层面，为应对当代全球社会生态困境提供了富有洞见的理论依据与学术视野。

从理论构成上来讲，作为一种统摄性伞形概念的马克思主义生态学，主要涵盖三大理论谱系——经典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理论、欧美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以及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毋庸置疑，经典马克思主义为当代国外生态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帝国主义批判”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学理基础。概括来讲，马克思和恩格斯虽从未明确提出“帝国主义”及相应衍生的“生态帝国主义”概念，但其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资本论》《自然辩证法》等经典著作中，深入剖析了资本主义扩张实质、运行机制及其与自然环境的内在联系。这些论述蕴含着丰富且极具前瞻性的资本主义生态批判思想，为洞察生态帝国主义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根基。基于马恩

经典论述和出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迫切需要,第二国际时期希法亭、卢森堡、列宁等人相继着重对帝国主义的概念与形式、逻辑与机理进行了深入的理论与讨论,为“生态帝国主义批判”进一步奠定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与分析基础。在对比分析和吸收大量事实及理论成果的基础上,列宁先后在《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自决权》《帝国主义论》等核心文本对帝国主义问题作出了科学论断,主张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并且帝国主义本身是一种垄断资本主义,其核心特征包括垄断组织的主导地位、金融资本的高度集中、资本输出的扩大以及国际垄断同盟对世界的重新瓜分,并且从全球范围来看,“资本主义已成为极少数‘先进’国对世界上绝大多数居民实行殖民压迫和金融扼杀的世界体系”^[12](P323-327)。

在前述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奠基基础上,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国外生态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帝国主义批判”研究呈现出清晰的阶段性发展与理论深化轨迹。他们依托不同的学术阵地与理论资源,围绕如何继承或重构马克思与恩格斯的生态思想、如何理解与应用列宁等人的经典帝国主义理论等核心议题,逐渐形成了以下四条极具代表性的“生态帝国主义批判”路径。

(一) 空间政治经济学批判

“空间政治经济学”(Spatial Political Economy)批判以结构主义哲学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方法论根基,致力于从整体性与系统性的视角出发,揭示空间现象背后深层的社会结构和权力关系,并着重批判生态帝国主义对地理景观的破坏及其所造成的全球不平衡发展。确切来讲,该路径滥觞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人文地理学“理论化”转型中形成的结构主义地理学传统,大卫·哈维(David Harvey)、威廉·邦奇(William Bunge)和理查德·沃克(Richard A. Walker)等代表性理论家始终聚焦于资本主义的空间逻辑与生态政治问题,强调空间政治经济学研究应率先向资本主义制度发难。其中,对帝国主义议题与全球环境危机关注最为密切且研究深入的首推哈维。他不仅继承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传统,还引入地理学与生态学的分析框架,系统阐释了资本积累、空间扩张与自然资源掠夺之间的复杂关联,这使其学术思想在当代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界备受重视。哈维对于生态帝国主义问题的分析,着重回应了传统生态批判的“空间失语”,并将“新帝国主义理论”嵌入其中,力图“循着过剩资本的轨迹去寻找与它们的吸收或贬值相联系的基于地理和领土的实践”^[13]。

从空间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视角审视,生态帝国主义的运作逻辑实质上可以归结为三重维度。其一,在全球生态尺度上,生态帝国主义通过空间扩张与殖民手段,将发展中国家生态系统改造为支撑核心资本主义国家工业化的资源储备库。这一过程超越了单纯的经济交换,体现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自然与社会空间的暴力重组,其根本目的在于通过“空间修复”(Spatial Fix)缓解资本的过度积累危机。其二,剥夺性积累(Accumulation by Dispossession)构成了生态帝国主义的核心运作机制。哈维所提出的这一概念继承并发展了马克思的原始积累理论,指出在新自由主义时期和新帝国主义阶段,金融资本、私有化、知识产权及技术垄断等手段被广泛运用,将公共资源与自然财富转化为资本积累的要素。该机制不仅延续了传统殖民主义的掠夺逻辑,更以制度化、隐蔽化的方式嵌入全球秩序,加剧了中心与边缘之间的不平等^[14]。其三,生态帝国主义依托话语霸权与意识形态建构,将生态危机合理化。不仅如此,资本主义还通过科学技术话语、现代化叙事等策略,将环境问题塑造为“发展必然代价”,掩盖其制度性根源^[15]。这种话语体系遮蔽了资本的反生态本性,使生态帝国主义行径得以在进步和文明为名的外衣下持续扩张,进一步强化了全球范围内的社会生态非正义。

空间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分析路径充分表明,生态帝国主义实质上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全球范围的整体性投射,它深刻体现在全球性的空间重组、资源配置与知识生产之中,其根本目标在于服务资本积累的永恒逻辑。因此,应对生态帝国主义的根本路径不在于资本主义内部的绿色修补或技

术性转型，而在于从制度根基上超越资本积累逻辑本身^[16]。这也正印证了哈维等理论家所强调的，资本主义的扩张是一种深刻的空间性过程，它通过重组地域关系与自然环境来维系权力与财富的集中。据此，追求“空间正义”（Space Justice）成为空间政治经济学批判应对生态帝国主义的关键实践方向。这意味着必须依托跨国社会运动、环境正义行动与公共空间的再创造，打破帝国主义对自然空间的圈占与重构，从而开辟出一条在全球尺度上兼顾生态可持续与社会公正的发展道路。

（二）世界体系政治生态学批判

“世界体系政治生态学”（The Political Ecology of the World-System）批判是一种将世界体系分析方法与政治生态学相融合的研究范式，旨在将生态帝国主义及其引发的系统性危机置于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中心位置加以剖析。该批判路径认为现代全球生态危机绝非孤立现象，而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在其长时段历史演进与内在积累逻辑驱动下的必然结果。事实上，自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于20世纪70年代提出世界体系理论以来，学术界逐渐认识到全球资本主义并非由彼此孤立的民族国家简单构成，而是一个以“核心—半边缘—边缘”三级结构为基本框架的统一体系。在这一分析视角下，不同的经济任务依据全球地理空间进行布展，并通过国际分工体系不断再生产与强化某些国家的主导性霸权地位，资本、劳动力与商品的跨国流动则塑造并维持了全球范围的不平等交换关系^{[17] (P16)}。沃勒斯坦对依附理论及主流发展理论（尤其是现代化理论）所进行的批判性回应，为后续学者在全球尺度上审视生态环境问题提供了重要理论基础，同时也奠定了将世界体系分析与生态批判相融合的先导性框架^[18]。

进入21世纪，该批判路径进一步聚焦于“生态不平等交换”（Ecological Unequal Exchange）这一关键议题的探讨，并力图将其归结为生态帝国主义的核心运行机制。其中，阿尔夫·霍恩堡（Alf Hornborg）在《机器的力量：全球经济、技术和环境的不平等》等代表性著述中指出，当前存在一种南北对立的生态不平等，即身处现行世界体系中心地位的北方地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产业进步和技术创新都是建立在对南方边缘地区国家的资源、土地和劳动力剥削基础上，其实质及核心危害体现为一种生态不平等交换^{[19] (P35-65)}。对此，霍恩堡认为亟须对现代性产物——货币、能源与技术的综合体系实施根本性的改造，将人类从生态帝国主义所掌控的全球剥削框架中解脱出来。与此呼应，斯蒂芬·邦克（Stephen Bunker）与保罗·西坎特尔（Paul Ciccantell）以铁矿石、石油和木材等关键大宗资源为分析对象，揭示了自然资源的地理分布与开采条件如何深刻影响全球经济权力的重构与转移。他们指出，核心国家通过持续的技术革新——尤其是大规模运输系统的演进，不断降低从边缘地区获取原材料的成本与能耗，从而巩固其世界体系中的主导地位。这一过程不仅加速了全球资源的不平等单向流动，更将生态破坏与社会成本系统地转嫁至外围区域，形成深重的“生态债务”（Ecological Debt）。最终，生态帝国主义凭借资源剥夺、运输优化与技术控制的三重链条，实现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等级化统治与持续性积累^{[20] (P221-246)}。

近年来，世界体系政治生态学批判进一步将生态帝国主义研究与“气候正义”（Climate Justice）、“人类世”（Anthropocene）等前沿性议题结合起来^[21]。譬如，有研究者借助跨国面板数据、物质流模型与生态足迹评估等量化分析方法，揭示出“核心—半边缘—边缘”国家在碳排放、废弃物转移和资源进出口方面的系统性不平等，分析得出不同国家环境治理的有效性因该国在世界体系中的收入水平而异，由此指明了“人类世”概念对全球政治内在的不平等、剥削和权力关系的遮蔽^[22]。这些研究同样为分析与应对“生态帝国主义”所造成的全球社会生态非正义问题提供了有力支撑。

（三）新陈代谢断裂批判

“新陈代谢断裂”（Metabolic Rift）批判路径以马克思的“物质代谢”（Stoffwechsel）概念为理

论根基,力图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人与自然物质代谢关系的系统性破坏,并由此深刻批判生态帝国主义所依托的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反生态本质。针对克罗斯比奠基的全球环境史学的生态扩张批判路径,约翰·贝拉米·福斯特(John Bellamy Foster)、保罗·伯克特(Paul Burkett)、布雷特·克拉克(Brett Clark)等新陈代谢断裂批判理论家积极开展学术对话。他们批评指出,克罗斯比所谓的生态帝国主义从生态扩张批判的研究范式出发,仅仅涉及欧洲殖民主义所带来的生态系统永久破坏性问题,却忽视了生态扩张背后隐含的社会生产关系变革,因而无法深入解释资本主义全球化背景下作为世界政治经济中心国家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边缘国家的掠夺、剥削和统治以及资本主义国家间的相互竞争。

不同于前述两种批判路径,新陈代谢断裂批判更为注重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绿化”的原初理论资源,并且在研究中更加强调列宁的经典(科学)帝国主义理论的应用。正如福斯特所指出,“帝国主义代表着世界资本主义制度所固有的全球裂痕,是一种有组织的反对生态革命的反动力量……21世纪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灭绝阶段”^[23]。基于现实的全球政治经济事实考察,他进一步归纳出生态帝国主义的核心特征:中心国家对外围及半外围地区自然资源的系统性榨取,导致后者赖以生存的生态系统发生严重退化;这些地区大规模的人口与劳动力流动,亦与其自然资源的被掠夺和转移过程紧密相连;中心国家利用边缘地区在社会制度与生态监管方面的薄弱环节,不断巩固其帝国支配格局;生态废弃物的转移与倾倒入进一步加剧中心与边缘之间的发展鸿沟^[24]。在《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生态革命:与地球和平相处》等多部著述中,福斯特更为明确地强调,生态帝国主义深植于全球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通过对全球生态资源的控制和盘剥,资本得以维持其世界体系秩序下的安全稳定与持续增殖^[25]。总而言之,新陈代谢断裂批判所界定的生态帝国主义,是指大量财富与资源以非正义方式从外围或半外围国家流向中心资本主义国家并构成其资本积累重要基础的同时,造成前者及全球生态系统持续恶化的政治经济现象。

为彻底终结生态帝国主义,新陈代谢断裂批判路径主张必须推动具有生态社会主义属性的社会关系重构,以实现全球治理体系及社会自然关系的根本变革^[26]。更确切地说,未来反对生态帝国主义的斗争应在“以革命性方式加速社会环境转型”的基础上,围绕“物种意识”(Species Consciousness)和“反抗灭绝”(Extinction Rebellion)两大核心概念,从主观与客观两个维度展开^[27](P366)。具体来讲,主观路径指向人类意识的根本转变,即超越个体与族群局限,形成将人类视作整体并承认与其他物种平等共存的生存发展意识;客观路径则强调反帝国主义革命与生态革命必须协同推进,二者相辅相成,才会构成超越代谢断裂、走向绿色未来的完整政治实践。

(四) 社会生态转型批判

“社会生态转型”(Social-Ecological Transformation)批判是当代批判性政治生态学中的一种重要理论取向,旨在系统批判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内在反生态性与社会不公正性,并主张通过社会制度结构与生态关系的协同变革,以期实现人类社会可持续与公平公正发展。近年来,在吸收融合波兰尼的大转型理论、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国家规制理论等思想资源基础上,社会生态转型批判的代表人物乌尔里希·布兰德(Ulrich Brand)和马尔库斯·威森(Markus Wissen)从“帝国式生活方式”(Imperiale Lebensweise)这一概念切入分析,来系统阐释生态帝国主义的具体表象及其实质。在他看来,这一概念既适用于描述发达资本主义世界中一种暂存性的既坚持追求优越物质生活水平又能够维持较高生态环境质量的生产与生活样态,又可以用来概括一种等级化且具有排斥性的由北方国家主宰且享受绝大部分物质成果、但主要由南方国家承担生产劳动社会代价与环境污染的资本主义世界市场^[28](P38-51)。

具体来讲,在社会生态转型批判路径中,生态帝国主义首先被理解为北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凌驾于南方发展中国家之上的系统性霸权。凭借在资本、技术和产业链上的优势,发达国家在资

源获取、产业控制以及环境责任分配等方面占据主导地位。全球南方则长期作为原材料与能源的供应地，不仅难以获得产业升级的机会，还要承担生态退化与环境污染的主要代价。这种南北不平等格局，正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通过非正义的国际分工格局、经济秩序及交换体系将生态利益固化为北方优势、将环境风险转嫁给南方的必然结果。其次，该批判路径揭示出资本主义国家正以“绿色资本主义”（Green Capitalism）为名延续生态帝国主义的战略企图。通过气候治理、生物经济和可再生能源等新兴议题，发达国家正从事实层面将全球生态危机转化为新的政治经济博弈场域。譬如碳交易机制、绿色金融体系、环境技术标准等手段，在很大程度上来看都是资本积累的延伸并且催生出新的投机领域，它们一方面为发达国家开辟新的市场与利润空间，另一方面作为制度工具巩固着发达国家的全球治理权威。在此格局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推动自身“绿色经济”增长的同时，持续加剧着全球南北之间的生态不平等与其内部之间的“生态帝国张力”^[29]。

与其他批判路径尤为不同的是，社会生态转型批判着重吸取了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先驱的葛兰西在文化和政治视域下的帝国主义理论资源，以此深刻凸显“帝国式生活方式”在社会文化与日常实践中的全面嵌入。它不仅表现为宏观政治经济结构中的依附与剥削关系，更浸透于普通人的日常行为、文化心理和价值认同之中，成为一种近乎“自然化”的存在。确切来讲，在社会文化层面，“帝国式生活方式”不断塑造着人们对“现代性”“发展”和“美好生活”的想象，使得全球南方社会在潜移默化中将高能耗、高消费的北方国家生活模式标举为普适标准与追求。在日常实践层面，它则集中体现为能源密集型尤其是依赖化石能源的生活习惯，这些实践在不断推广与宣传中逐渐被正当化、常态化，进而隐匿了其背后的资本推手与生态代价。这意味着转型不仅是技术与制度的变革，更需挑战这种深植于日常实践中的生态—社会关系，推动形成一种以民主、公正与生态可持续为核心的“团结式生活方式”（Solidary Mode of Living）。就此而论，社会生态转型批判强调唯有通过反霸权斗争和替代性实践，方能在当代世界面临的“危机的叠合”^[30]中开辟真正的社会生态转型道路。

三、“生态帝国主义批判”的马克思主义生态学检思

（一）把握国外生态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帝国主义批判”限度

总体而言，通过对上述国外生态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帝国主义批判”研究路径的系统梳理，可以清晰地看到，该领域的相关研究已在概念建构、问题意识与理论谱系等层面呈现出明显的成熟化、体系化与建制化趋势，并逐渐发展为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中一个获得广泛承认与持续讨论的重要专题性领域。这一研究取向在揭示全球资本主义扩张与生态危机之间的内在关联、深化对帝国主义当代形态的生态维度理解方面，具有不可忽视的理论贡献。然而，亦应看到，现有研究尽管在理论规模与多样性上不断扩展，但其思想视野与方法论路径仍存在一定局限，尤其是在价值立场、分析框架与实践指向等方面，暴露出值得中国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界高度警惕并加以反思的问题。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对国外（尤其是欧美）生态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帝国主义批判”理论进行批判性审视，本身亦构成推动该批判理论进一步发展的必要前提。

首先，在价值立场层面，国外生态马克思主义所形成的“生态帝国主义批判”路径，整体上仍受制于一种隐性的欧美中心主义意识形态和叙事模式。尽管相关研究在理论上高度关注全球南北不平等、生态负担转嫁以及历史责任分配等问题，但反映在知识生产结构之维，全球南方往往仍被置于“被分析对象”而非“理论建构主体”的位置。在此语境下，源自“全球南方”国家长期反抗生态掠夺与发展依附的本土思想资源与实践经验——譬如拉美地区关于“超越发展”（Beyond Development）与“美好生活”（Buen Vivir）等方面的探索，在欧美主流学术讨论（尤其

是主流发展理论)中往往被边缘化,更多被视为经验材料或政策案例,而非具有同等理论地位的思想资源^[31]。相应地,欧美学界的研究重心仍主要集中于对北方国家霸权结构、资本逻辑及治理机制的批判性剖析,而对全球南方作为抗争主体所展现出的能动性、创造性与替代性实践路径,缺乏充分的理论吸纳与学术回应。这种不对称的知识结构,客观上削弱了“生态帝国主义批判”在全球范围内的解释力与解放潜能。

其次,在分析结构层面,现有“生态帝国主义批判”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仍依赖以“中心—边缘”为代表的相对传统且静态的理论分析架构。以“中心—边缘”分析框架为例,其在揭示世界体系的生态不平等格局方面的确颇具启发意义,但同时与方法论上日渐显现出双重不足。一方面,相关研究往往将“全球南方”国家主要刻画为生态剥削的被动承受者,分析重点集中于北方国家通过生态不平等交换、污染转移与资源掠夺等机制施加的压迫行为,而对南方国家在现实中通过南南合作、区域治理创新以及替代性发展路径探索等方式所展现出的主动调适与应对能力,缺乏足够的理论回应。另一方面,现有理论尚未充分解释当代全球权力关系中日益凸显的流动性与复杂性现实,即部分新兴经济体在全球层面仍是生态帝国主义的受害者,但在区域或次区域层面,却已然复制乃至施行类似的生态强权行为,成为秉持“次级帝国主义”(Subimperialism)逻辑的生态霸权输出者与资源掠夺者^[32](P54-73)。这种角色的叠加性与权力关系的流变性,显然已经超出了传统“中心—边缘”模型的解释范畴,也暴露出既有分析框架在动态性与复杂性把握上的不足。因此,如何构建一种能够同时把握权力流动、角色转换与多层级互动关系的跨学科动态分析框架,已成为深化“生态帝国主义批判”不可回避的学术任务。

再次,在应对策略与实践指向层面,国外生态马克思主义关于生态帝国主义的批判研究虽在揭示当代新自由主义积弊与资本扩张逻辑等方面展现出极强的理论锐度,但在提出可操作性较强的现实战略路径方面整体上仍显乏力。现有研究提出了包括“生态社会主义的去增长”(Ecosocialist Degrowth)、“稳态经济”(Steady-state Economy)等在内的一系列替代性愿景,这些构想在规范层面为突破资本主义生态危机提供了重要思想资源^[33]。然而现实问题在于,这些方案往往停留于高度抽象的价值宣示或理论呈现之中(譬如2001年的《生态社会主义宣言》、2009年的《贝伦生态社会主义宣言》以及2014年的《利马生态社会主义宣言》),缺乏与具体国家发展阶段、政治经济结构及现实约束条件相匹配的过渡机制与政策工具设计。尤其对于仍处于工业化、城镇化与社会公正多重发展重压下的“全球南方”国家而言,这类方案在缺乏差异化路径设计的情况下,往往难以落地实施,甚至可能被视为脱离现实的规范理想,从而陷入生态乌托邦主义境地。此外,尤为值得深刻探究的是“生态帝国主义批判”在运用阶级分析方法所面临的理论张力与实践困境,这集中体现在其核心变革主体——“环境无产阶级”(Environmental Proletariat)这一日趋模糊的概念中^[34]。该范畴原本力图整合全球范围内遭受生态剥削的群体,然而其内部在生存方式、受剥夺的具体形态及政治经济诉求上却存在根本差异。将全球南北国家的失地农民、土著社群、有色人种、环保主义者、妇女以及传统工人等各类群体在理论上一并涵括于同一“阶级”范畴之下,不仅可能遮蔽彼此间深刻的物质利益分歧乃至潜在冲突,更将在实践层面实质性地削弱其作为一个统一的“红绿”政治行动主体所必需的内部凝聚力与明确变革方向。

(二) 强化经典帝国主义与“生态帝国主义批判”的有机关联

可以清晰地看到,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部分绿色左翼学者与帝国主义批判理论家愈发倾向于从文化、制度与技术等维度理解生态帝国主义,有意或无意地淡化乃至消解了经典帝国主义理论所强调的资本垄断、军事暴力与政治经济压迫等核心属性。尤其是随着“帝国转向”“后殖民转向”“文化转向”等研究热潮的兴起,涌现出一批“没有帝国主义的帝国研究”^[35]。可以说,以欧美中心主义取向为代表的诸多西方左翼理论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拒斥乃至抛弃了马克思列

宁主义的帝国主义理论及其分析范式^[36]。这一理论偏移导致“生态帝国主义批判”正面临严峻的概念稀释与理论误读风险。譬如，比尔·沃伦（Bill Warren）试图修正列宁关于“垄断资本寄生性”的论断，将帝国主义包装为推动全球市场发展与第三世界进步的积极力量，从而弱化了对全球北方资源掠夺行为的道德批判^{[37] (P97-98)}；乔瓦尼·阿里吉（Giovanni Arrighi）同样在实践中放弃了对经典帝国主义范式的关注，他明确指出传统的帝国主义理论已不再适用，转而以“霸权循环”模型分析资本主义大国间的竞争，忽视了金融资本与国家机器合谋进行全球剥削的机制^{[38] (P171-173)}；迈克尔·哈特（Michael Hardt）和安东尼奥·奈格里（Antonio Negri）更是从“扁平世界”的视角出发，断言帝国主义理论已不再适用于当代全球化格局，宣称“帝国”是超越国家主权的全域统治新形式，并将经典帝国主义视为理论羁绊^[39]。

然而事实表明，尽管当代帝国主义表现形式发生了新变化，但其实质并未改变。帝国主义本质上依然体现为少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剥削与压迫，垄断资本依旧是理解当代帝国主义的核心范畴。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科学论断至今仍对本文所聚焦的“生态帝国主义批判”研究具有重要指导意义。正如福斯特所强调的，列宁将帝国主义视为“垄断资本主义的特定历史阶段”的论断在当今依然有效，21世纪的资本主义并未超越垄断与金融资本主导的阶段，而是进入了更极端的“晚期帝国主义”（Late Imperialism）^[40]。在此意义上，所谓“生态帝国主义”并非独立于帝国主义之外的另类现象，而是经典帝国主义逻辑在自然-社会关系维度上的当代延伸。就此而论，理应将“生态帝国主义”这一概念界定为：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凭借政治、经济、军事、技术等多重力量，综合运用霸权性或排斥性的扩张行径、话语体系与制度设计来主导全球资源分配与生态治理，从而实现资本持续增殖的权力结构及其实践机制。

现今国际政治的演变同样进一步印证了经典帝国主义理论的科学解释力与学术生命力。全球新冠肺炎疫情肆虐期间，西方国家推行“疫苗民族主义”、垄断供应链、设立绿色贸易壁垒，系统性地压迫全球南方，鲜明体现出生态压迫与经济剥削的复合形态。俄乌冲突中，欧美对俄罗斯的能源制裁与全球能源市场操控，以及近年来伊以冲突、印巴冲突等多起地区冲突中对关键矿物、水资源、能源通道乃至生存空间的争夺，均表明生态资源已成为当代地缘政治博弈的核心对象与关键诉求，其背后依然是垄断资本与帝国主义强权的逻辑驱动。更为直观且突出的实例是，2026年初，特朗普政府发起了对委内瑞拉的军事干预，并强制绑架了尼古拉斯·马杜罗（Nicolás Maduro）总统及其夫人。这一“国家恐怖主义行为”（State Terrorism）的核心意图，在于通过军事手段摧毁委内瑞拉的政治独立，而其根本目的则是控制该国的战略资源——尤其是石油和矿产资源^[41]。此过程中，美国所秉持的“生态帝国主义”逻辑昭然若揭。更为关键的是，委内瑞拉与古巴在经济、政治和国家安全领域有着长期的密切合作。自乌戈·查韦斯（Hugo Chávez）执政以来，委内瑞拉每年向古巴供应大量廉价石油，以支撑其经济社会运转和国防军事建设^[42]。而如今，马杜罗政府的垮台势必会对古巴的社会主义政权构成重大冲击^[43]。由此可以看到，美国的“生态帝国主义”行为不仅体现在物质层面的资源攫取，更深植于其削弱拉美地区社会主义运动的地缘政治意图之中。

正因如此，当代“生态帝国主义批判”必须立足于经典帝国主义理论的坚实根基。倘若脱离以列宁为代表的经典（科学）帝国主义分析范式，不仅会导致概念的虚化与稀释，更可能遮蔽其内在的政治经济学逻辑。尤其是在保守主义、单边主义浪潮抬头与国际秩序深刻变革的当代，生态帝国主义更应当被理解为资本主义依托军事强权、经济政治封锁与制度霸权来重塑全球资源分配与实施生态控制的必然产物。唯有回到经典帝国主义批判的理论传统，方能克服当下国外左翼帝国主义研究中过度“去政治化”“去暴力化”以及“去政治经济学化”的偏向，重新赋予“生态帝国主义批判”以理论清晰度与政治战斗力，使其成为揭示资本主义生态剥削本质、推进全球社会生态正义的有力武器。

(三) 加快推进“生态帝国主义批判”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构

当今时代,生态危机已不再是孤立的环境议题,而是深深内嵌于全球资本主义扩张逻辑之中的核心矛盾。在这一新的历史条件下不断演化的生态帝国主义,已然成为一种全球性统治机制,维系着中心国家在全球生态体系中的支配地位。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与拉美地区在门罗主义及其当代变体(特朗普政府推行的“唐罗主义”,Donroe Doctrine)影响下所遭受的直接资源榨取不同,近年来中国所面临的生态帝国主义压力,更多表现为以G7国家集团为主导,在气候政治、贸易规则、技术标准及国际舆论等领域展开多维度、系统化且更趋隐蔽的战略围堵。此举不仅旨在削弱中国在国际市场中的竞争力、制约其产业升级与发展自主,更深层次地反映出当代生态帝国主义转向争夺话语权与全球治理主导权的意图。在此现实背景下,若仅依赖西方既有的知识体系来解读并应对当前挑战,不仅难以准确把握中国所处的复杂国际境遇,更易陷入理论被动与话语依附的困境^[44]。因此,当代中国的“生态帝国主义批判”亟需实现根本性的范式转向:必须自觉将“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理论品格内化为其精神底色,从而构建一种真正面向全球资本主义社会生态问题的批判理论与实践形态^[45]。

总体而言,中国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界围绕“生态帝国主义批判”所展开的自主知识体系建构,应体现为学理形态、话语形态与战略形态三者的有机统一与内在贯通。在这一框架中,学理形态奠定知识体系的价值根基与认知基础,构筑其理论内核与学术自觉;话语形态负责构建具有解释力与传播力的叙事体系,推动知识体系的清晰阐释与国际对话;战略形态则着眼于向实践转化的路径与方向,促进知识体系转化为现实影响力与具体行动。三大要件相互支撑、层层推进,共同构成具有理论说服力、话语感染力与实践引领力的完整知识体系。

首先,在学理形态层面,应以标识性概念为核心,夯实自主知识体系的理论内核。学理形态作为知识体系成立的根本前提,其关键在于能否形成具有自主性问题意识和逻辑自洽性的概念系统。进入21世纪以来,在回应全球资本主义新变化与中国和平崛起发展的深刻互动中,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自觉坚持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持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形成了一系列重大理论成果与方法论指引,如“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深化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在实践基础上推动理论创新”“坚持系统观念和辩证思维”“坚定历史自信与增强历史主动”等。这些源于中国现实社会生活与历史实践的结晶,不仅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蓬勃发展奠定了坚实根基,也为其提供了根本的方法论遵循。在此引领下,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界逐步构建起一套层次分明、逻辑自洽的标识性概念体系。该体系以“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为根本旨归,确立了区别于资本主义的发展范式与文明愿景。概括来讲,其理论内核主要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哲学观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观构成,其中,前者超越了西方“主客二分”的工具理性思维局限,后者创造性破解了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对立难题,共同指向“美丽中国”的实践目标。放眼全球,“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与“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等主张,将“共同体”理念拓展至国际场域,倡导共生共赢的治理哲学;同时,坚守“公平、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等原则,有力维护了“全球南方”国家的“发展自主权”与全球社会生态正义。这套源自中国实践、具有内在统一性的马克思主义生态学标识性概念体系,不仅在本体论、价值观与方法论层面系统构成了对西方主流生态理论的超越,更直接塑造了一个理解与批判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系统性反思框架。未来,唯有自觉并充分运用这一自主且系统的概念工具与理论架构,中国的“生态帝国主义批判”研究才能从根本上确立其独立的学理自觉与学术主体性。

其次,在话语形态层面,应以凝聚全球南方共识为导向,推动自主知识体系的有效表达与国际传播。话语形态是学理形态实现社会化与国际化的关键中介,其核心任务在于将高度理论化的学理内容,转化为能够被多元主体理解、接受并运用的政治话语、学术话语与公共话语。在当代

全球环境治理场域中,中国并未简单移植西方“普世价值观”或“绿色资本主义”的话语逻辑,而是通过持续关注“气候正义”“自主发展空间”“国际秩序公正合理转型”等关乎广大发展中国家核心利益的关键议题,逐步构建起面向全球南方的社会生态正义叙事^[46]。这一话语实践,不仅有助于揭露生态帝国主义行径的实质,也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国际传播注入更为坚实的叙事支撑与道义力量。面向未来,话语形态的构建亟须在以下三个方向协同推进,以形成系统性、突破性的话语能力。其一,坚持主体性表达,坚定不移地运用中国自身的理论框架与概念体系解读全球社会生态问题,从根本上突破西方在相关议题上的话语垄断;其二,注重共鸣性建构,自觉立足全球南方的共同历史境遇与现实发展关切,着力塑造能够激发情感共鸣与利益协同的话语联结;其三,推动分层化传播,系统构建并区分运用面向国家决策层的政治话语、面向学术共同体的学理话语以及面向社会公众的公共话语,以此形成立体化、精准化的传播网络。通过上述路径的有机结合,方可将学理形态所蕴含的理论智慧,有效转化为能够在全世界范围内赢得认同、动员实践的强大话语权,从而全面提升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国际辐射力与感召力。

最后,在战略形态层面,应以改造现实世界为旨归,推动自主知识体系向实践转化。战略形态是理论获得现实影响力的最高形式,其核心在于相关智识能否转化为稳定、可持续的制度体系与系统性实践。在国内层面,中国通过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丰富实践及其改革,形成了一系列具有原创性且可复制推广的制度创新,例如生态保护红线制度、生态环境分区管控体系以及绿色发展评价机制。这些实践不仅超越了西方“先污染、后治理”的传统工业化路径,也为全球南方探索可持续发展的现代化模式提供了可行的制度范本。在国际层面,中国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突破了以排他性国家利益为中心的治理传统,确立了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为构建更加公正且包容的全球环境治理体系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框架。在此过程中,通过绿色“一带一路”、南南环境合作、金砖国家合作机制等多边战略平台,中国将生态正义、共同发展等核心理念具体化为合作议程与制度安排,实质性地推动国际秩序朝着公正平等、民主包容的“去帝国主义化”方向演进。上述从国内制度到全球治理的现实探索,构成了“生态帝国主义批判”自主知识体系在实践维度上的重要支撑。这同时也提醒学界,未来的研究不仅要继续在学理层面打造自主知识范式、在话语层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更需在战略层面持续推动理论向实践转化,真正实现改造世界的根本使命。

参考文献

- [1] 刘文明. 从全球视野与生态视角来考察历史——克罗斯比治史方法初探[J]. 史学理论研究, 2011(1).
- [2] Crosby, A.W. *Ecological Imperialism: The Biological Expansion of Europe, 900—1900*[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 [3] [美] 艾尔弗雷德·W·克罗斯比. 哥伦布大交换——1492年以后的生物影响和文化冲击[M]. 郑明萱, 译.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8.
- [4] Davis, M. *Late Victorian Holocausts: El Niño Famines and the Making of the Third World*[M].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2002.
- [5] Diamond, J. *Guns, Germs, and Steel: The Fates of Human Societies*[M].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1997.
- [6] Ashcroft, B., G. Griffiths, H. Tiffin. *Post-Colonial Studies: The Key Concepts*[M]. London: Routledge, 2013.
- [7] Nixon, R. *Slow Violence and the Environmentalism of the Poor*[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 [8] Huggan, G., H. Tiffin. *Postcolonial Ecocriticism: Literature, Animals, Environment*[M]. London: Rout-

- ledge, 2015.
- [9] 江玉琴.后人类视角下后殖民生态批评的尺度、机遇与发展[J].中国文学批评,2019(1).
- [10] Maskey, M. Marxian ecology and sustainable human development[J].*Monthly Review*, 2023(7).
- [11] 苗旭琳, 郇庆治.马克思主义生态学视域下的“西方气候正义话语”辨析[J].学习论坛, 2025(1).
- [12]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列宁全集(第二十七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7.
- [13] Harvey, D. In what ways is ‘the new imperialism’ really new?[J]. *Historical Materialism*, 2007(3).
- [14] 付清松.资本再生产批判视阈的反向延展——大卫·哈维的剥夺性积累理论探赜[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2016(1).
- [15] 王平, 赵路强.哈维当代资本主义生态危机诊断的时空观向度[J].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 2022(4).
- [16] 赵睿夫, 李夏洁.“地球工程”是人类世危机的解法吗——基于环境人文社会科学的分析[J].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3).
- [17] Frame, M.L. *Ecological Imperialism, Development, and the Capitalist World-System: Cases from Africa and Asia*[M]. London: Routledge, 2022.
- [18] [美] 马里科·弗雷姆, 田方晨, 刘明明.基于世界体系理论视角的生态帝国主义研究[J].国外理论动态, 2024(2).
- [19] Hornborg, A. *The Power of the Machine: Global Inequalities of Economy, Technology, and Environment* [M]. Devon: AltaMira Press, 2001.
- [20] Bunker, S.G., P.S. Ciccantell. *Globalization and the Race for Resources* [M].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5.
- [21] David, C., F. Danielle, U. Ike, et al. The unequal geographies of climate finance: Climate injustice and dependency in the world system[J].*Political Geography*, 2022, 99.
- [22] Sommer, J.M., A. Hargrove. Power and politics in the world-system: A cross-national analysis of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J]. *Journal of World-Systems Research*, 2020(2).
- [23] Foster, J.B., H. Holleman, B. Clark. Imperialism in the anthropocene[J].*Monthly Review*, 2019(3).
- [24] 贾雷, 郇庆治.资本主义“红绿”批判的三重维度——新陈代谢断裂理论、生态帝国主义与新资源榨取主义[J].国外社会科学, 2017(2).
- [25] Brett, C., F.J. Bellamy. Ecological imperialism and the global metabolic rift[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parative Sociology*, 2009(3-4).
- [26] Foster, J.B. Some preliminary theses on the concept of eco-civilization[J]. *Monthly Review*, 2025(8).
- [27] Foster, J.B. *Capitalism in the Anthropocene: Ecological Ruin or Ecological Revolution* [M]. New York: NYU Press and Monthly Review Press, 2022.
- [28] [奥] 乌尔里希·布兰德, 马尔库斯·威森.资本主义自然的限度:帝国式生活方式的理论阐释及其超越[M]. 郇庆治, 等编译.北京:中国环境出版集团, 2019.
- [29] Brand, U., M. Wissen. Eco-imperial tensions: Decarbonization strategies in times of geopolitical upheaval [J]. *Critical Sociology*, 2025(4-5).
- [30] Brand, U., M. Wissen. Global environmental politics and the imperial mode of living: Articulations of state-capital relations in the multiple crisis[J]. *Globalizations*, 2012(4).
- [31] 刘琦.拉丁美洲的超越发展理论:一种绿色左翼话语[J].国外理论动态, 2019(6).
- [32] Valencia, A. S. *Sub-Imperialism Revisited: Dependency Theory in the Thought of Ruy Mauro Marini* [M]. Leiden: Brill, 2017.
- [33] Foster, J. B. Planned degrowth ecosocialism and sustainable human development [J]. *Monthly Review*, 2023(3).
- [34] 李素琴, 张云飞.环境无产阶级是新兴革命主体吗? ——福斯特的生态革命主体理论及其评析[J].理论月

刊,2025(8).

- [35] 释启鹏. 世界政治中的帝国研究: 经典传统与当代复兴[J].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2025(3).
- [36] Foster, J.B., G.Rockhill. Western marxism and imperialism[J]. *Monthly Review*, 2025(10).
- [37] Warren, B. *Imperialism: Pioneer of Capitalism*[M].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1980.
- [38] Arrighi, G. *The Geometry of Imperialism*[M].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1983.
- [39] Bashir, A. M. The illusions of empire[J]. *Monthly Review*, 2004(2).
- [40] Foster, J. B. Late imperialism: Fifty years after Harry Magdoff's the age of imperialism [J]. *Monthly Review*, 2019(3).
- [41] Communist Party USA. *Free the Maduros! Jail Trump!*[EB/OL]. <https://www.cpusa.org/article/free-the-maduros-jail-trump/>, 2026-01-03.
- [42] Herrera, G.A. Petr6leo y gas en Am6rica Latina: Un an6lisis pol6tico de relaciones internacionales a partir de la pol6tica venezolana [J]. *Documentos de Trabajo Real Instituto Elcano de Estudios Internacionales y Estrat6gicos*, 2006(20).
- [43] Whitney, W. T. Jr. *U.S. Blockade of Venezuela Is Also an Attack on Cuba*[EB/OL]. People's World. <https://peoplesworld.org/article/u-s-blockade-of-venezuela-is-also-an-attack-on-cuba/>, 2025-12-19.
- [44] 郇庆治, 赵方. 作为一种政治认识论的当代资本主义批判理论[J]. 求是学刊, 2024(5).
- [45] 习近平. 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N]. 人民日报, 2016-05-19(02).
- [46] 王亚茹. 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国家身份认同: 基于“自我-他者”互动建构视角的分析[J]. 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5).

Marxist Ecology's Exploration on the "Ecological Imperialism Critique"

ZHAO Fang, HUAN Qing-zhi

Abstract: "Ecological Imperialism Critique"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Marxist ecology refers to a systematic critical analysis of global capitalist socio-ecological problems. This approach, which originates from classical Marxist critical concepts and methods, has been consciously developed through critical theories and intellectual currents represented by the Ecological Marxism. Unlike the pioneering research in fields like Environmental History, the foreign Ecological Marxism has successively produced four highly representative critical pathways: the critique of spatial political economy, of world-system political ecology, of Metabolicrift, and of Social-Ecological Transformation. Its critical focus and divergences primarily center on two core questions: "What is Ecological Imperialism?" and "How should we study and respond to Ecological Imperialism?" Looking ahead, research must deepen in three areas: First, fully grasp the limitations of foreign Ecological Marxism's "Ecological Imperialism Critique"; Second, consciously strengthen the organic connection between classical imperialism and the "Ecological Imperialism Critique"; Third, accelerate the construction of an autonomous Chinese knowledge system for "Ecological Imperialism Critique". The study holds critical significance for breaking through western discourse monopolies, responding to the justice demands of the Global South, and advancing toward a new future of global socio-ecological justice.

Key words: ecological imperialism; Marxist ecology; ecological Marxism; China's autonomous knowledge system; global governance

(责任编辑 孙洁)